

導 言

游 鑑 明*

2007年年底，近史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以「戰爭與性別」為研究議題，並展開各種學術活動，包括舉辦讀書會、召開國際會議等。之所以提出這項構想，是基於過去中國戰爭史的研究偏重政治與外交，相形之下，西方國家結合性別與戰爭史的研究，已累積豐碩成果，因此，研究群相信推動「戰爭與性別」研究，將為臺灣戰爭史和婦女史，帶來新的視角。

2008年12月10到11日，研究群邀請臺灣、中國大陸、韓國、日本、歐美與澳洲的18位學者，參加「從性別看現代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他們分別從發生在臺灣、中國、美國、歐洲、韓國、越南的戰爭中，尋找性別課題，並進行對話。會議結束後，本刊編委決定收錄該會的主題演講與論文，做為本期專號；除部分學者的論文暫不發表之外，經過審查，呈現在本期的有周慧玲、洪郁如、俞彥娟、張玉法和宋漢理(Harriet Zurndorfer)等五篇論文。也因此，本期有兩篇專論與三篇書評，另有「從性別看現代戰爭」專號。

戰爭時期，為加強作戰力量，幾乎每一個國家都發起動員群眾的工作，而且不論男女，全是國家動員的對象，因此，回顧戰爭史的研究，戰時動員的議題占相當多數，從如何向民眾宣導戰爭觀念、編列組織到各組織活動工作的分配與進展，都有學者討論，其中動員女性的研究不少於男性動員。不過，在這類著作中，鮮有學者透過社會文化史的視角，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探究戰時的服裝問題，洪郁如的論文不只具開創意義，也予人耳目一新。嚴格來說，戰爭期間因為經濟緊縮，再加上，為防範各種偶發狀況，極少有國家注意民眾服裝是否需要一致化的問題，但日本卻在民眾的服裝上，大作文章，還引起各界討論。

日本對服裝的關注，主要是為了發揚日本國民性，因此，就如洪郁如指出，早在統治臺灣初期，日本殖民政府就注意臺灣女性的服裝，進入戰爭時期，服裝更成為動員人心的項目，儘管日本國內或臺灣都掀起服裝改良的話題，但在殖民地產生的矛盾和調整，更有意思，例如，具民族色彩的旗袍或是臺灣在地傳統服裝雖然遭受反對，卻因能節約資源、又方便活動，被合理化；到戰爭末期，意識形態的服裝管制甚至屈服在現實需求下。洪郁如提到一個重要現象，臺灣女性對服裝改良的回應，其實相當受流行文化影響，也不完全與民族主義掛鉤。

面對戰爭，民眾除了接受國家動員之外，也會主動參與戰爭。張玉法即指出，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中國女性的走向前線、投入戰爭，有主動和被動兩種，當時不管前方、淪陷區或大後方，都有女性從事各種戰地服務、武裝戰鬥、文教宣傳與兒童保育等工作，其中女青年從軍更為顯著例子。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是被侵略的國家，女性的積極應戰是可以理解；然而，如果只是聲援他國而捲入戰爭，這個國家的民眾該如何因應這場戰爭？女性或女性組織又會抱持何種態度？

以越戰為例，在沒有經過國會討論與正式宣戰下，美國從軍事援助轉變成派遣軍隊進行轟炸的行為，引起美國多數民眾的撻伐，但俞彥娟發現，具有和平主義、女性主義和公民行動特質的「美國女選民聯盟」，卻對究竟接受或是反對美國政府的越戰政策，產生爭議。為深入瞭解問題癥結，俞彥娟試圖從該組織的歷史發展、運作方式與思想基礎，分析聯盟內部對越戰態度分歧的原因，因為就越戰的侵略性和暴力本質來說，聯盟似沒有理由支持越戰，不過，該組織向來重視「程序」，凡是違背「超越黨派」、「先研究後行動」原則的行動，難以獲得共識。儘管聯盟對越戰政策完全沒有影響力，俞彥娟認為聯盟還是發揮公民教育的成效，提供解決爭議的平臺。從聯盟處理越戰議題看來，女性組織面

對戰爭的反應，其實是相當複雜，也提醒我們注意研究這個議題時，不能忽略組織的本質。

前面提到，過去戰爭史研究著重政治、外交，其中部份因素與史料取得較容易有關，而涉及戰時民眾生活的史料，則因為付諸闕如，沒有受到研究者特別重視。不過，戰爭結束後，人們對戰爭的記憶陸續經由電影、小說、自傳、回憶錄或口述紀錄等呈現，在這些文類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戰時的生活素材、逃難經驗、個人與集體創傷。因此，如何把官方史料和大眾的歷史記憶交相運用，再現戰爭，是相當有意義的研究。敘述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戰地難民湧向後方的情形時，張玉法除了留意各地難民人數、國民政府的難民救濟條例之外，還引用不少訪談資料，透過男女受訪人的親身經歷，生動地刻劃民眾的逃亡過程，並發現相對於男性，女性在逃難中的處境特別困難。同時，張玉法也利用訪問紀錄，分析淪陷區和大後方女性的不同際遇和日常生活，指出戰爭不但改變女性生活，也讓她們處在恐懼的生活中。

張玉法以不同的訪談史料勾勒戰爭，這種經由多方記憶展現的戰爭生活史，較不容易陷於孤證；然而，對傳主或述說者有意迴避真相的敘事文本，讀者就很難掌握真實。周慧玲反覆比對顧正秋的本傳三本傳記，發現這三本分別在 1967 年、1997 年和 2007 年由傳主自述的傳記，竟然有不小落差。從第一部傳記開始，傳主便以迴避、留白、代言的方式，言說她親歷的戰爭，並留下許多空白，到第二、三部傳記才逐漸增補空白，以致於「欲語還休」、「欲言又止」成為顧正秋傳記的特色。周慧玲認為，或許是因為顧正秋的表演專業，讓她懂得製造懸宕氣氛，引起讀者好奇；但回首一場始終未落幕的國共戰爭，周慧玲反而覺得顧正秋在前期傳記裡的沉默、不說，不是無聲，而是噤聲的最佳代言，是對噤聲時代的婉轉又強烈的異議。因此，到兩岸開放探親和臺灣解除戒嚴，顧正秋的迴避開始峰迴路轉，漸次把戰爭所歷經的傷痕和療癒過程，展現出來。

無疑的，顧正秋不斷採取一種刻意略過、又逐一拾回的撰述／回憶方式，是海峽兩岸長期對峙的另類戰爭的結果，也回應當時代海峽兩岸

的歷史情境。周慧玲同時強調，顧正秋的自我表述，遠超越傳統女性的隱忍，而且在「說」與「不說」中，她本人有充分選擇權。然而這是女性傳記書寫戰爭歷史的特色，還是所有傳記的特色，值得進一步研究。

經過閱讀慾望與書寫慾望的不斷衝撞，我們或許找到曾經被遺忘的戰爭足跡，以及當時代人們的創傷歷程；然而，歷史家如何利用這些史料重寫戰爭歷史？宋漢理以比較史的方式，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研究，如何利用性別概念去處理中國女性和歐洲猶太女性對戰爭經驗的陳述，帶領我們從高點俯瞰中、西方戰爭與性別史研究的變遷。宋漢理指出，受新社會史和女性史研究崛起的影響，關於歐戰的研究在戰後有很大的轉變，其中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歷史，隨著個人和集體敘事文本的陸續產生，學者十分關注女性在戰爭的角色與活動，除了受性暴力的女性之外，在家庭、教會、市場、集中營女性的日常生活，成為研究重點，因為戰爭不完全發生在前線。這與張玉法重視前方、淪陷區和大後方女性不同的生活，有異曲同工之妙。

其實戰爭不只改變人們的生活，也讓他們觀念和行為不同於過去，宋漢理從中國或西方學者的研究中發現，過去被視為必須當個賢妻良母的女性，為了生存，她們和男性一樣，違背對家庭、國家的忠誠。宋漢理還特別提醒，以性別概念閱讀敘事文本，固然能解開女性的沉默；但對選擇性的敘述方式是否能呈現真實，學者頗為懷疑，至於戰時敵對雙方在撰寫戰爭歷史時，因受制於當前雙方政治或經濟考量而各說各話的書寫方式，也令人不安。這些問題，為戰爭與性別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

這五篇透過性別概念，對不同時空戰爭史或戰爭史論著進行探究的著作，十分有助於「戰爭與性別」的研究；不過，對近史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而言，這只是研究的開端，往後不但會繼續推動這項計畫，而本刊也會陸續刊登相關論文，讓這個研究議題更加茁壯。